

城市规划学科的发展方向

吴志强 于泓

摘要 从西方城市规划学科和行业面临的严重困境出发, 讨论了中国城市规划学科在蓬勃发展的城市建设背景象下潜伏的危机。指出目前中国的城市规划学科的核心理论的空心化, 理论创新的情性化以及理论研究阵地的孤立化问题, 提出中国的城市规划学科与国际城市规划学界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上, 但同样面临着从一个相关学科引入“规划中的理论 (Theory in Planning)”为主导的发展阶段, 进入一个以人居空间研究为中心核心研究对象, 建构新一代的“规划本位理论 (Theory of Planning)”为主线的理论体系创新的新的历史性时期。文章进一步讨论了城市规划理论界未来进行理论突破的重点方向, 进而指出中国规划理论学界必须结合 1) 资源和能源供应极限的环境特征; 2) 高强度城镇化的区域特征; 3) 全球化背景下竞争性的动力特征; 4) 社会结构历史性转型的人群特征; 以及 5) 信息网络高科技引起的空间聚散特征, 回归城乡空间规划对应时代特征的空间复合意义的扎实研究, 在提供对中国的城镇化和城市发展实践强有力的理论指导的同时, 也完成对国际城市规划理论体系新一轮构建的贡献

关键词 城市规划 核心理论 学科发展

中图分类号 TU98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3363(2005)06-0002-09

[作者] 吴志强,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院长, 教授, 博士生导师
于泓,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博士研究生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URBAN PLANNING DISCIPLINE

WU Zhiqiang, YU Hong

Abstract: Beginning with the predicament faced by Western urban planning discipline and practice, this paper identifies the hidden crises behind the booming development of urban planning schools and studies in China, namely, the lack of theoretical underpinning, the lack of theoretical creativity, and the lack of theoretical linkage from other disciplines. Although positioned on different development stages, the paper argues that the urban planning academe worldwide is on the verge of entering into an era of 'Theory of Planning' from the traditional epoch of focusing on 'Theory in Planning'. It further discusses the need for a systemic approach to establish a space-oriented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urban planning that embraces the principles of habitat, and particularly emphasizes that Chinese urban planning academia have to fully comprehend contemporary challenges and take them as the starting point of future research: 1) the environmental challenge of natural resources depletion; 2) the challenge of intensive urbanization; 3) the challenge to incentive structure under global competitiveness; 4) the social challenge of societal transformation; and finally 5) the changing nature of space due to the new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he author thus calls for the Chinese urban planning discipline to strive for an international status in its research and theory building, that are at the same time valid in a Chinese context, contributing to healthy urbanization process and strategic city development.

Keywords: urban planning, essential theories, development of discipline

1 概况

1.1 2005年9月, 在马来西亚槟城 (Penang) 召开了第八届 APSA 会^[1] 双年国际大会, 除 APSA 的亚洲学者以外, AESOP、ACSP、ANZAPS^[2] 等世界其他大洲的规划院校组织也有众多学者参会发言, 在会议期间所折射出的问题令人深思: 一方面, 几乎所有的学者都在不同的场合表示, 中国的城市规划在国际规划学会上达到了一个空前的有影响力的地位, 专程赶来筹备明年世界大会的世界规划院校大会国际指导委员会主席 Louis ABRECHTS 教授在大会上强调, 在最近的 5 年中, 中国的城市规划教育对世界规划界开始产生重要影响, 同济大学是全世界影响力提升最快的规划学校。在亚洲最高级别的城市规划学术论坛中, 有大量来自中国的学者进行发言交流令人高兴和鼓舞。另一方面, 西方的规划院校都普遍面临招不到好学生, 招不满学生的状况, 不得不依靠国际学生特别是亚洲的学生维持适当的规模。很多城市规划专业的系、所不断缩小, 这很令人震惊。为什么欧美的城市规划专业经过了

1970、1980年代的社会学和经济学学术拓展后,今天规划教育反而面临如此窘境,这是一个值得大家思考的问题。

1.2 柏林工大(TU Berlin)区域与城市规划研究所所走过的道路也同样具有警示意义。1972年,柏林工大在欧洲大陆所有的大学中间,最早地创办了独立于建筑学之外的城市规划专业,5位城市规划专业教授与另外6位来自城市经济学、城市社会学、国民经济学、区域地理学、建设法学和统计学专业的志同道合的教授携手,组合形成一个新的城市规划专业——城市与区域研究所。该所完全与建筑系平行,在德国代表了一个全新的城市规划学派。这一代人把城市规划从纯粹的物质城市设计地位提升到了城市经济、城市生态、城市社会、城市土地、城市地理等更广阔的天地中。他们发起成立了欧洲城市规划院校联合会(AESOP),形成欧洲城市规划的一面旗帜。然而进入1990年代以后,随着这批教授的退休,这个研究重地在学校中的地位不断下降,最终被建筑学院重新整合,这面旗帜最终倒了下去。处于春天里的中国城市规划学科,难道不会面临这样的危机吗?

1.3 学科的拓展给学生造成的迷茫同样不容忽视。目前全国城市规划院校的数量呈现一种爆炸性的扩张(图1),城市规划学科课程设置也逐渐与国际接轨。城市规划专业指导委员会指定的核心课程减少到了8门,所占学时也下降到了总学时的不足1/3,各个院校根据自身的特点和渊源,开设了包含地理学、管理学、林学、信息技术等诸多相关专业的课程(陈秉钊2004)。一时间,城市规划教育覆盖的领域空前扩大,城市规划学科的外沿不断向外延伸和扩张,形成了多领域、多模式、交叉性的结构体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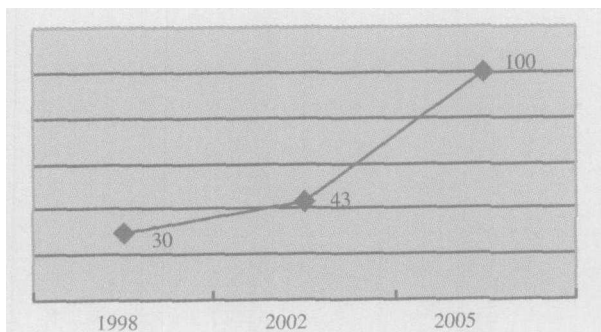


图1 全国(不含港澳台地区)开办城市规划专业的院校数量变化^[9]

学科的发展令人振奋,但却也造成了许多的误解。在ABBS论坛上学生对城市规划学科的发展前景展开了讨论,有不少人提出:城市规划是一门基础课,目前与城市相关的专业课都要学,但最后什么都讲不清楚。如果不把城市规划进行分解,划分为各个具体的相关专业,其结果就像经济管理专业一样毕业分配没人要。我们的学科日益拓展,但其结果却是我们的学生认为可以取消城市规划专业^[2]。从这个角度看,今天城市规划的核心概念,在学生的脑海中不是扩大了,而是被空前

的挤压了。形成这样的观念无疑是与我们目前的规划教育方法和内容有直接关系的。

学科构成的多元化模式是城市规划教育发展的必然潮流,但西方城市规划学科走过的道路和今天我们所面临的困惑都提示我们发达国家的模式并非完美,我们进行多元化教育的目标和内容仍值得进一步讨论。

2 今日城市规划学科的危机

2.1 核心理论空心化

很多规划教育工作者都已经注意到,1960年代以来,西方城市规划的核心领域逐渐出现了转型,设计和工程学科的主导地位受到动摇,社会、经济、政治和环境生态学的思想对城市规划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1980年代以后,城市规划理论中的主导思想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偏移(图3),城市规划学者不但丧失了对城市发展的话语权,而更不幸的是,为了争夺这种话语权,或是试图进入决策者的语境,城市规划学科简单地“交叉”了政治学、管理学、经济学或者社会学诸领域的观点来武装自己。这种“交叉”在一定的时间内形成了规划理论研究的蓬勃局面(1960~1980),但随着相关研究的不断地深入,城市规划却只能亦步亦趋,完全丧失了理论研究的主导地位,形成了规划理论的空心化局面。

学科交叉并非是核心理论空心化的罪魁祸首,学科的交叉的目的是形成“嫁接”,形成独立的、具有创新意义的研究领域和科学理论。而目前城市规划的交叉却没有形成自己的“知识产权”,反而促成了一大批其他领域的“大家”,或是将城市规划的学者“装扮”成了其他领域的专家,城市规划专业的影响力受到了明显的削弱,他们中的代表有:



图2 当前城市规划理论领域的几个热点人物,Saskia Sassen,David Harvey,Manuel Castells,Michael Porte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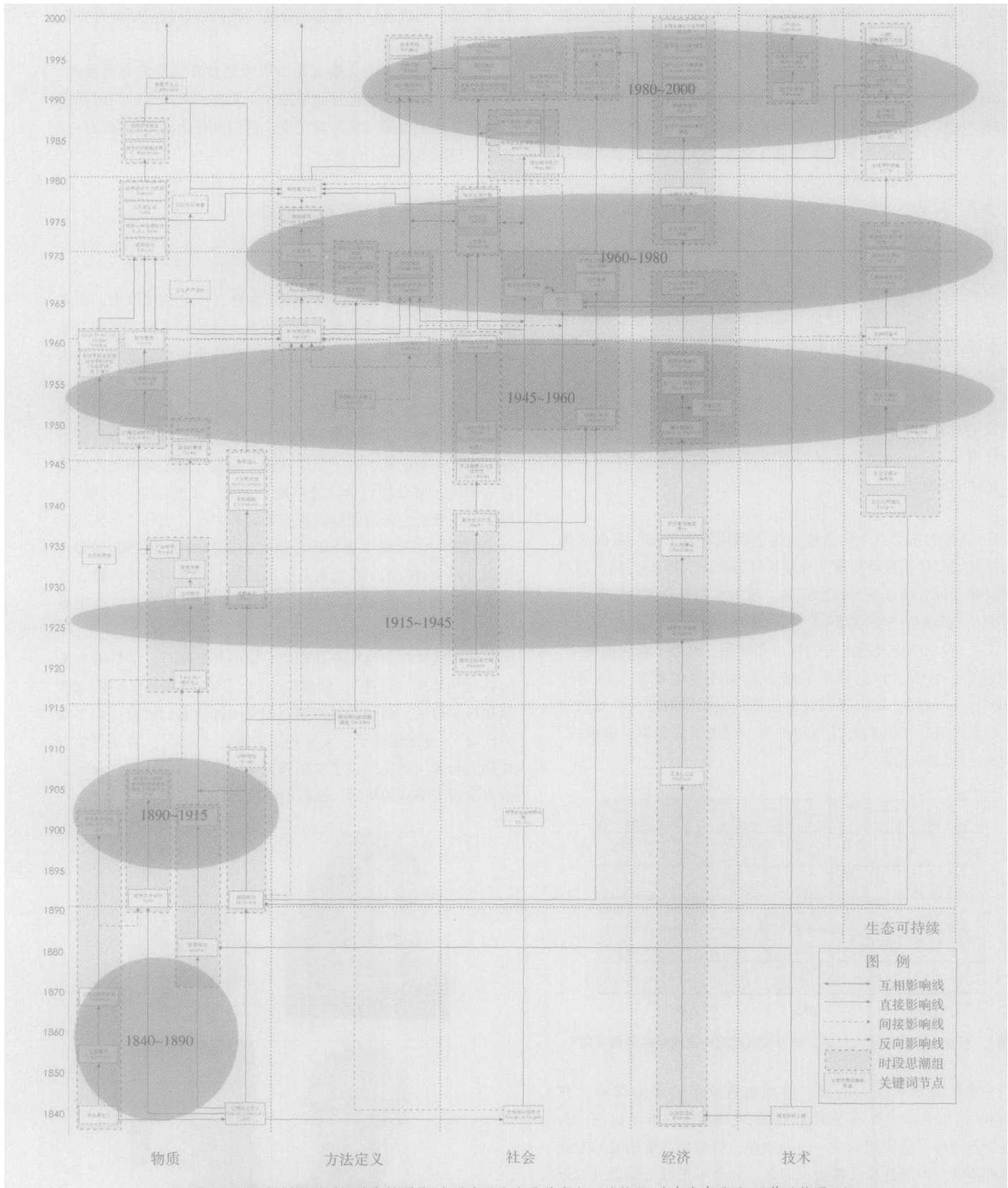


图3 城市规划学科讨论热点的漂移(本图甲中的内容是作者个人的整理,其中多有疏漏,还待继续深入)

Saskia SASSEN, 曾是哥伦比亚大学城市和区域规划教授, 转投芝加哥大学社会学任教授, 英国伦敦经济学院 (LSE) 社会学教授;

Manuel CASTELLS, 1979 被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城市与区域规划学系引进, 后索性到了社会学系做了教授, 身兼两职; David HARVEY, Johns Hopkins 大学地理学教授;

表1 城市规划主要思想的年代演进

年代	思想或著作
1890之前	大城市的阶级问题
	公园与城市扩展
	城市市政工程设计
1890~1915	田园城市
	城市艺术设计
	工业城市
	城市规划的数据调查
	城市社会的种族问题
1916~1945	当代城市
	新城运动
	法西斯思想
	城市之始与文明
	中心地理论
1946~1960	城市更新运动
	规划的标准理论
	城市社会的本质
	增长极理论
1961~1973	城市意象
	文化遗产保护
	社会决策批判
	城市规划批判
	规划中的多元倡导
	理性主义与综合性规划
	郊区化
	寂静的春天
1973~1980	城市设计作为政策
	马丘比丘宪章
	社会公正
	城市复兴运动
1981~1990	城市设计宣言
	城市社会政策批判
	我们共同的未来
1990以来	新都市主义
	精明增长与紧凑城市
	沟通规划
	政权理论与城市政治
	妇女在规划理论中的方向性影响
	21世纪的城市:走向三大和谐
	全球化理论与全球城
	信息经济
	可持续发展

深色部分是城市规划相关领域的引入理论,可以发现这部分的内容在近年以来有明显的增加。

Micheal PORTER, Harvard 商学院教授;

.....

诚然,并非历史上所有的城市规划思想都来自于规划师的脑海,甚至大多数不来自于职业规划师的创造。但历史上也从未有一个时期,规划所依托的思想距离城市建设的实践这么遥远过(表1)。当美国规划院校联合会(ACSP)依然将土地使用规划列为城市规划第一任务的时候,我们是否考虑过对于土地布局模式和空间选址问题的研究有哪些交叉后的创新?有什么思想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

有学者认为目前的对于社会科学、法学、地理学、管理学、政治学的研究反映了城市规划的本质,是巨大的进步;但我们也必须看到,目前的规划理论依然处在“引用”阶段,在“放出去”的同时,“收回来”的观念却远远不够。如果不及时纠正,城市规划核心思想边缘化的局面将伴随着学科低层次的扩张而更加严峻。

核心理论的空洞,已经导致了今日西方城市规划教育的衰弱局面;核心理论的贫乏,已经致使规划师在城市决策中的发言权越来越少;常此以往,谁能保证我国规划行业不会走向消亡?

2.2 理论创新的惰化

一般地说,规划理论的集中产生总有特定的土壤,特别是增长方式的革命、对大规模建设的反思以及思想方式的变革,在规划史上,它体现为1890~1915工业革命期间、1961~1973战后重建和民权运动期间两次规划的思潮爆发。

今日的中国,几个重大的刺激外因几乎同时存在,正是应该极大地丰富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规划思想库的时代,而我们的城市规划学术研究却日益显现出人欲我欲、人云亦云的惰化,在大量引进国外时髦理论的同时,对于“中国现象”的研究始终保持在一个不温不火的局面上,没有集中性的理论突破,也缺乏持续性的观察研究,甚至连长三角、珠三角等中国特有的城市问题研究也大量依靠国际学者“出口转内销”式的研究来构建理论框架。今天的国际城市研究界,长三角研究引用率最高的文献竟然是某国外建筑师的一本专著,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城市规划理论界的悲哀。

这种问题的发生不能仅仅归咎与中国规划基础理论的长期贫血,它与许多规划研究人员的浮躁心态是分不开的。一方面引进一个新理论投入时间和精力少,另一方面还可以迅速成为某个方面的专家,比之穷年累月进行一个研究要显然要合算,更重要的是,还可以随时转变风向,迅速投入到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中去,成为永远的弄潮儿。

当然,这里我们充分肯定介绍国外理论和名著进入中国的重要性,没有知识的接轨,我们根本无法建立与世界平行的研究平台,但一个学科的巩固还是更需要创新型的知识 and 艰苦的基础研究。

理论创新的惰化影响的不仅仅是学科成熟的进程,面对着中国的环境和资源这两个危机性的难题,规划专业的无所作为就更为“规划无用论”站脚助威了:

1987~2000年我国的城市总面积从10816km²增长到248758km²,增加了23倍,而同期的城镇化水平从25.32%增长到36.22%,仅上升了10.9%;

2004年,中国的耕地资源总量下降到18亿亩的警戒线,直逼16亿亩的生存线,人均耕地1.4亩,仅为世界人均水平的2/5,而根据一般预测,中国还将有20%左右的人口脱离农业生产,进入城镇;

与此同时,中国人均水资源拥有量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全国600多座城市有2/3供水不足,特别是北京和西部部分城市已经处于国际公认的极度缺水的程度;

目前我国油气需求量为2.7亿t,而实际产量为1.8亿t左右,预测2020年能源需求为4.5~6亿t,我国的能源需求中的36%依靠进口,预计2020年达到60%,而其中建筑能耗占全部能耗中的28%(汪光焘2004);

……

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的城市规划学科如果在这些方面不能有所应对、有所突破,城市规划学科的地位将难以避免地会进一步下降。

2.3 研究阵地的孤立化

理论和研究的情性在规划教育上产生的后果之一,就是多学科的交叉在一些领域徒有其表,各个学科的教学内容与城市规划专业的实践性目标之间存在巨大的理论空白,难以形成紧密的连续。由于学科领域的不断外延,反而导致了城市规划学科的科研资源不断减少。同时,经济学、管理学、社会科学都逐渐成为城市研究的主导力量,面对社会需求也更有灵活性,唯独城市规划学科和学生面对的需求市场越来越狭隘。



图4 乱成一锅粥的规划讨论

在许多领域,并非是有了“城市”+“XX学”这样的组词结构就可以实现学科的交叉和交融,就可以让城市规划在其中占有一席之地。例如,城市生态学、城市社会学等领域早已经形成了比较固定的学科,传统意义上的城市规划学科却在其中应用较少,参与甚少,贡献更少,几乎已经完全成为了“人家的学科”,这样的交流恐怕迟早会变成“蚕食”。

孤立化的多学科教育对以技能培训为主的本科生教育造成的影响相对较小,但会造成我们前面提到的,一些青年规划师的虚无主义,认为“规划师什么都可以说说,但说什么也不明白”;影响到硕、博士生的教育则是表现为研究能力的下降和研究领域的狭隘。在近年不少的硕、博士学位论文中出现了这样的问题:理论综述部分经常是旁征博引、诸子百家,但进

人实证和结论部分,还是干巴巴讲一些1950~1960年代规划师的口头禅,那些进口的理论都丢到了九霄云外。

博士生的教育目标是培养研究型人才,如果这部分青年学者不能有清醒的认识和应用的能力,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尤其困难。今天,我们这些的教育者责任重大。

3 城市规划学科的发展方向

提出这些规划学科和教育面临的问题,并非是为了让大家对学科交流提高警惕,严防门户,而是为了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良好的局面面前保持必要的紧迫感和责任感。中国的城市规划学科要真正成为一门科学,还需要利用学科交叉的有利条件,填补理论的空白,创造更多的“硬件”支撑。

3.1 学科核心理论的向空间化回归

当前西方城市规划学科的衰弱过程很大程度上是与西方城市规划社会后现代社会的思潮相联系的。在这个否定权威、强化多元,呼吁个体价值观的时代中,城市规划的学者进行了多方面的反思,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论调是城市规划专业形成了“话语霸权”(Willem Salet, Adreas Faludi, 1999),认为以前的规划是利用一系列的术语将非专业人士隔绝在门外,形成了规划专家自己的沙龙。在这样的思想路线下,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进入沟通、交流和对话的规划方法研究中^[5]。城市规划的霸权主义消除了,同样消弭的还有城市规划的理性自信和生长空间。

我们并不否认这种自我批判的意义,但这种批判一旦被错误地引申为城市规划不需要自己的权威领域,不需要构建一个城市规划具有主导地位(而不是服务地位)的“理论场”,城市规划学科能否名副其实就大成疑问了。

对于现代城市规划的支撑体系有四元论:经济学、公共管理学、社会学、政治学(梁鹤年2004);或三元论:理想主义、理性主义、实用主义(仇保兴2005)等不同的认识;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城市空间和城市设施是各种思想的共同目标。脱离了城市空间的城市规划无法成为一种职业,城市规划学科也难以立足。

纵观百年以来的城市规划理论演进,城市设计始终是城市规划学科的支柱之一(图3的框架中也可以发现这一点)。其间城市设计潮流虽屡有起伏,也多次嫁接了其他学科(如社会分层理论、公共政策理论)的思想,但其植根于城市规划学科的本性却基本没有受到挑战,至今英国的规划教育体系中仍有62%的院校设置城市设计专业,在英国规划院校的专题研究课程中位居第二位(唐子来2003),这是与城市设计无法动摇的空间属性是不可分割的。

随着对城市规划本质问题认识的不断升华,我们从艺术角度处理空间的观念逐步过度到从经济、生态、社会、政治等各个角度来认识城市空间形成的原因、研究分布城市空间的技术、完善管理城市空间的手段。在从巨大的理论思想宝库中汲

取营养的过程中,城市规划学科拓展应该立足于巩固“空间问题”这个基石,对周边学科的空间属性进行挖掘,将城市空间的多重属性与相关学科的空间化指导意义相融合,形成不断扩大的城市规划核心理论圈。

图5概念性地表达了城市规划核心理论的构筑模式,其中中心思想,是通过相关学科空间化的研究,将“放出去”的城市规划理论视野,在经过吸收——创新的过程后,形成独立的多元空间或区位理论,并以此形成城市规划学科具有权威话语权的思想与实践领域,应对我们所实际操作的工作对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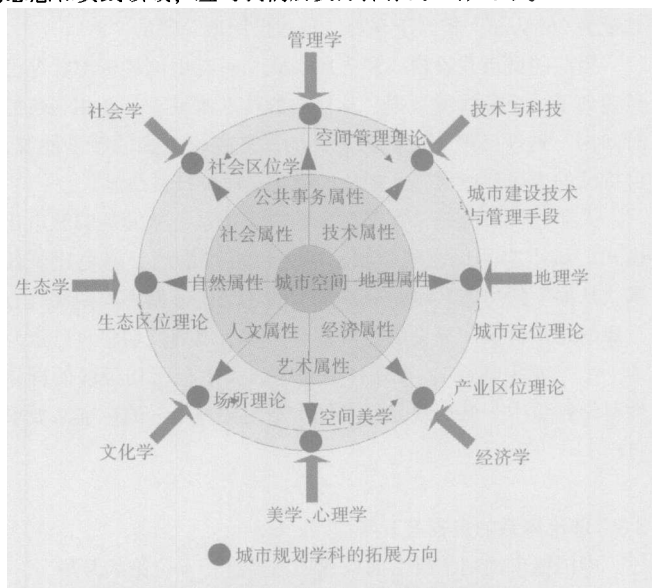


图5 城市规划学科核心理论的概念性框图
(本图并不全面,仅做示意性说明)

在这个圈层中,仍然有巨大的理论空白点等待规划工作者来弥补,如表2:

.....

表2 亟需弥补的城市规划理论空白

产业区位理论	研究新经济,网络化等浪潮造成的产业选址问题
社会区位理论	空间布局与社会分层的关系,社会的和谐或骚乱与空间规划的关系
空间生态理论	各种生态要素在城市中的合理分布
城市定位理论	多背景条件下城市的性质、规模定位,以及由此产生的矛盾的解决方案。
空间管理理论	市场经济背景下城市空间经营和管理的价值标准,符合和谐发展观念的城市空间评价体系

以上各种理论空白点仅仅是管中窥豹,它们都是今天的城市规划必须解决而没有解决好的问题。随着这些研究领域的推进,城市规划的技术权威性和实施可能性都可以得到根本上的提高。

今天的城市建设已经出现了环境保护的一票否决,公共参与的一票否决,城市规划何时能够提出自己的“一票否决”技术要求,也才真正能够确立本学科不可动摇的理论地位。

3.2 根植于中国实践的应用研究

成功的经验是学习的榜样,但并非成功的保证。步入城市世纪,我国城镇快速增长,目前城镇化率已经达到41.7%,按照世界城市化规律曲线,已处于城镇化加速起翘期的中期。

根据大多数国家的经验,伴随城镇化的深入,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将得到进一步提高,国民的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持续得到改善,逐渐走向发达和富裕。但同样也存在反面的案例,拉美国家的经验同样表明,如果没有适合本国国情的城市发展思路,城镇化发展也可走向过度城镇化和城市贫困化的反面极端。

探索和研究根植于本土,顺应自身发展需求、适应地区发展规律的城市规划理论、技术,既是学科自强自立的要求,也是今日城市规划学科的历史责任。

从中国的现状出发,我们的学科至少在三个方面的研究是具有关键性意义的:

3.2.1 区域尺度的空间规划研究

在“十一五”期间,中国将进入这个城市化加速期关键性的中期,大规模的现代化城市建设将从根本上奠定未来中国城镇化的普遍模式和在较长时间内稳定的形态。

国外的经验表明,发达国家都是异常重视这个城市化曲线起翘阶段的全面空间规划。这一方面是由于建设总量巨大,产生的历史影响深远,另一方面是生活方式的全面转型促使人们重新思考自己未来的聚居形态。英国大伦敦规划、德国国家国土空间规划都是在这一时刻的前期开始编制实施。

在“十一五”期间,中国赖以成功的低成本低门槛的竞争优势面临严重的挑战。同时在国际间转移的低端产业的总量会逐渐减少,分羹的对手却越来越多;而在中高端领域,任何一个中国城市在与国际高等级对手竞争的时候都显得底气不足:

上海,市区面积2057km²,2002年人口为1334.23万人,2004年度上海市的GDP为760亿美元。

大伦敦,面积1580km²,2001年伦敦人口为718.8万。按市区人口计算,2004年度伦敦市的GDP为2847亿美元。

纽约,面积780km²,市区人口700多万,2004年度纽约市的GDP为4070亿美元。

东京,总面积2155km²,2003年人口约1229万,按市区人口计算,2004年度东京市的GDP为7848亿美元。

香港,总面积达1103km²,2003年年底,香港人口约680万,按市区人口计算,2004年度香港市的GDP为1640亿美元。

柏林,总面积883km²,人口约339万。2004年度柏林市的GDP为1017亿美元(图6).....

低效能的土地利用和羸弱的经济实力显示了中国城市与国际城市竞争高级产业时的无力,也指示了我们未来的改进方向:通过区域合作,集成比较优势,为迎接新一轮产业转移竞争而准备。

从国际学界的发展看,区域研究也同样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对“新区域主义(New Regionalism)”“全球区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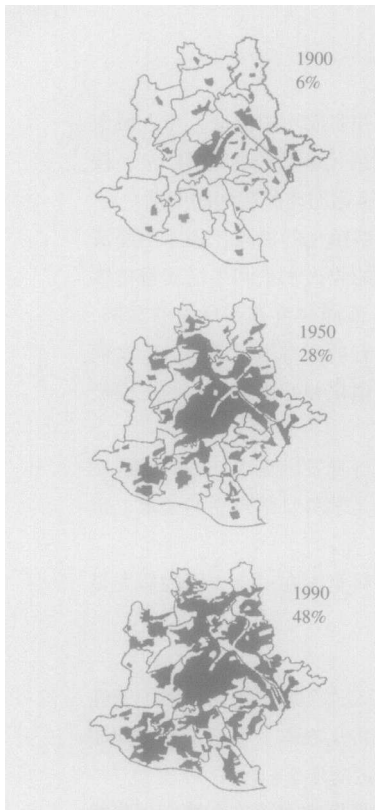


图6 德国城市化水平变化
1950~1960年代正是德国大规模进行国土空间规划的时期

(Global Region)”的研究已经成为城市乃至国家应对经济全球化的共同选择 (Roger Simmonds, Gary Hack, 2000)。

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以来,市场理论对国家层面和区域层面的空间规划实践缺乏宏观引导,人口和资源的流动依赖不完全信息条件下的市场杠杆调节,缺乏应对国际竞争的布局企图。同时具有法定地位和实施强制力的区域空间规划的缺位,使国家宏观的战略构想难以实现。

通过建立有效完整的全国城乡空间规划体系,尽快结束没有战略性空间布局与时间发展计划的盲目城镇化,推进中国区域科学有序地发展,对国家已是当务之急,重中之重。

3.2.2 回归“人的尺度”的城市规划研究

城市设计规划的发展是与人的发展不可分割的,现代城市规划和城市理论的奠基者 Howard, Sitte 等人都是从人的视角来观察城市和环境,为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建成环境的和谐和友好做出了启迪性的贡献。

在城市规划学科不断扩展的今天,我们发现脑海中人的影响不断地模糊,电缆、厂房和银行中流动着的许多数字成为我们思维中的单元,今天城市规划经常站在市民的对立面,难道与这种思想立场的差异没有关系吗?换一个角度思考,即使是城市规划政策具有超越个人利益的经济理性或技术理性,这种选择如果能够通过人的尺度描述出来,城市规划也将获得更多的公众支持。

回归“人的尺度”的城市规划要求学科从多个方面同时推进:在空间维度上,要求规划研究关注人的心理和生理要求,转变自己目前的“直升机”似的视角,进行大量的基础性实验和实证性研究;在社会维度上,关注社会各个阶层的发展状况,尤其是从农村转移过来的“新市民”^[7]的生存状态,不能继续用“城市人口”的同质化称谓抹杀多样的社会需求;在地理维度上,将“全球转移”、“全球选址”等时髦术语更多地与人在数量与质量上的转移和分布结合起来,与这种转移对人的生活方式和品质造成的影响联系起来,真正从社会和谐,也就是人的和谐的角度进行我们的研究。

3.2.3 可持续的人居环境研究

土地和能源资源的紧缺是中国城市化面临的首要难题。但规划研究的缺位造成的损失更加剧了资源矛盾的紧张程度。

在1991~2000年间,我国设市城市建设用地平均每年增长1022km²;2002年城市建设用地增加2460km²,征用土地2880km²,建设用地增加值是前10年平均值的2倍多,征用土地是前10年平均值的3倍以上(陈秉钊,2004)。

同时,到2004年底,全国城镇规划区范围内共闲置土地720km²,空闲土地562km²,批而未供土地1356km²,三类土地总量为2638km²,相当于现有城镇建设用地总量的7.8%。

当前的城市建设模式和人居模式相对与中国的资源状况已经达到了一个危险的极限,从目前的技术水平看,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地球已经不可能为人类的发展提供更多的新型能源,可持续的人居环境研究所担负的历史使命也日益凸显。

人居环境研究是一个多层面的知识体系,从宏观的城市化模式、城市空间形态到微观的社区自组织系统、绿色建筑技术,从面上的生态环境研究到点上的建筑生命循环周期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显见的经济效益。城市规划长期将自己定位为一个“龙头学科”,在这样一个与人类生存密切关联的群体性科学领域中,城市规划没有理由不用“领先”的标准来要求自己。

3.3 理论体系的自省与升华

中国城市规划学科走向成熟还需要进行本位论的升华。

应该说,今天中国所遇到的规划无用主义论调与西方国家在1950~1960年代所面临的问题是极其相似的。了解西方城市规划史的学者可以发现,1950年代的西方所面临的城市建设背景与我国的现状颇有相通之处。城市一方面进行了战后大规模重建,另一方面城市更新运动的成就也蔚为可观。

城市更新运动的起源标志是1949年《新住房法》的颁布,主要内容为大规模的清理拆除贫民窟以及不合标准的劣等住宅、重建衰落地区、改善住房条件、恢复城市中心区经济活力、减少种族隔离等等。

但在实际操作中,由于受到了利益集团压力、官僚机构低效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导致其为低收入者提供住房的主要目标被扭曲,开发与计划实施、实际需求相互脱节,无法解决牵涉面广而复杂的住房问题,地方政府作为计划的具体实施者,并不真正关心低收入者住房问题,而是为了振兴城市经济、增加政府财政税收,注重商业发展;强势利益集团(垄断资本)同样不关心住房问题,只是借更新之名,进行高档住宅和商业开发,牟取高额利润。

更新计划不但没有达到预期目标,而且还由于政策本身存在的问题,产生了许多新的社会问题,从而招致社会各界的抨击。1961年,“那个土里土气、穿着网球鞋的小老太太”Jacobs更是尖刻地讽刺道:“Howard创立了一套强大的、摧毁城市的思想”、“现代城市规划理论都是从这种愚蠢的东西(Howard和他的田园城市)改编过来,或用它来装饰自己”、

“(分散主义是)以破坏以至摧毁城市的为已任的处方”、“最知道怎样把反城市的规划融进这个罪恶堡垒中的人是一个欧洲建筑师,名叫 Le Corbusier”,……一时间,城市规划的弊端几乎是赤裸裸地暴露在公众舆论之前,城市规划的公信力雪崩般地下坠,规划工作者即使如 Mumford 也不得不为捍卫自己的事业而大声辩护。

但我们也不得不承认,西方城市规划正是在这种辩论和反思之后,真正丰富和成熟起来的。自省而后的升华,使西方的城市规划对自己的工作方法、工作对象和工作程序有了更全面的认识,从此由现代主义迈向多元和人文的后现代主义时期。Jacobs 和她的著作也成为了城市规划理论教科书中极为重要的一部。

1900~1960年,西方用了60年的时间寻找到了建构规划理论体系更广泛的平台,我们希望在第二个60年到来之前,中国的城市规划界可以对快速城市化过程的进行一个客观的、具有世界影响的理论总结,可以组织起自己完整的、合理的学科门类,并形成广泛的职业价值的认同。

4 城市规划教育的应对

4.1 有一流的研究才有一流的教育。城市规划的教育模式与国际逐渐接轨的同时,中国课程内容应该具有独立的知识地位。

4.2 青年学子规划职业自我认同感的树立首先要从规划核心内容的集体认同开始。这要求城市规划的课程中有清晰的主线,过程安排有循序渐进的计划。

4.3 避免去物质化的极端。去物质化的极端认为以物质空间为核心的规划教育已不适应形势的需要,全面否定“功能主义”等传统规划思想。但去物质化之后未能建立起新的理论、技术系统,不但导致了教育与实际工作脱节,更使城市规划学科走入虚无主义的陷阱。

4.4 避免唯空间论的极端。唯空间论的极端片面理解规划核心空间化的含义,将一切与城市空间无关的知识从自己的视野中抛出去。其结果必然是无法从不断发展的人类知识中寻找新的结合点和知识交叉点,最终坐以待毙。核心空间化与教育开放化是“足”与“眼”的关系,站定生根而高瞻远瞩,才能培养出适应多元化社会规划力量。

5 结语

在中国城市规划理论和实践体系依然很不完善的背景下,城市规划学科发展中值得讨论,值得改进的问题还很多,例如,仍然没有完全转型的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矛盾问题,规划从业者的职业道德的问题,也有大量的相关知识需要我们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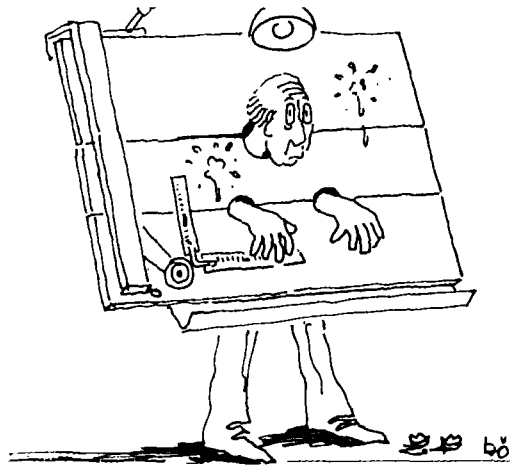


图7 被禁锢住手脚的城市绘图师

城市规划中实践应用,例如复杂理论,耗散结构理论,协同学等。这些方面的内容同样在城市规划学科的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但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内。

西方城市规划理论从理想主义起步,经历了理性主义的丰富和完善,走向了更广阔的社科学领域,其理论其方法和技术储备已经有了比较雄厚的基础。在这个特定阶段中,面临的规划核心理论的空心化问题和规划教育的衰落有可能是一个发展门槛和瓶颈,并不一定是城市规划最终趋势。但在国际学术交流日益频繁的今天,这种思想是在同步地影响着并不那么坚实和牢固的中国城市规划学科。盲目地追随国际学界的动态热点,漂移性地进行我们的研究工作,无疑对中国城市规划学科的发展弊多利少。

希望本文的抛砖引玉,能够使规划人,尤其是理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都能够从喧嚣中停顿片刻,重新审视我们的事业,思考一下我们在做什么,我们该做什么,我们必须做什么。能有这样的效果,本文就已经达到它的目的了。

(本文是笔者在《百年西方城市规划理论史纲》一书的不深入完善过程中,对片段性的思维整理的成果之一,感谢史柯、王伟等同志为本文整理基础素材)

注释

- [1] APSA, Asia Planning School Association, 亚洲规划院校联合会,是目前亚洲城市规划专业最大的国际性学术组织, APSA 主席办公室现设在上海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其第六届双年国际大会于2001年与首届世界规划院校大会同期在同济大学举行,第七届双年国际大会于2003年在越南河内建筑大学举行,今年九月在马来西亚槟城的圣马来西亚大学举办了第八届双年国际大会,共收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202篇论文,遴选后在大会上宣读的论文有89篇。 APSA 第九届双年国际大会将于2007在斯里兰卡召开,第十届双年国际大会将于2009年在印度召开。
- [2] AESOP 为欧洲规划院校联合会, ACSP 为美国规划院校联合会, ANZAPS 为澳大利亚新西兰规划院校联合会。
- [3] 该表的数据并非精确数,系根据相关文献和网络资料整理,可参

考陈秉钊 2004, 赵民 2004

- [4] 该部分数据由网络相关资料整理形成,可能并不准确,但具有说明性的意义
- [5] 1990年代以来城市规划理论界将沟通规划和合作规划作为城市规划方法发展的重大突破,诸多“先锋”学者投身其中,但城市空间领域的研究却停滞不前,难有突破,甚至在国际性的讲坛中,这些做基础性研究的学者也是缘铿一面
- [6] 该部分内容可以在 ABBS 论坛关于“应当取消城市规划专业”的讨论中找到, www.abbs.com
- [7] 目前城市中存在着大量被称为“民工”和“流动人口”的人群,这部分人群无论是从他们的生活空间和生活方式看,都已经是城市市民的一部分,从学术的角度看,“民工”和“流动人口”是一种区别对待的歧视,也不能唤醒城市的决策者对这部分人群正常需求的关注,作者认为应当将这部分人口称为“新市民”。

参考文献

- 1 张庭伟. 知识、技能、价值观:美国规划师的职业教育标准. 城市规划汇刊, 2004[2], 同济大学出版社.
- 2 张庭伟. 转型期间中国规划师的三重身份及职业道德问题. 城市规划, 2004[3]:66~72.
- 3 张庭伟. 新自由主义·城市经营·城市管治·城市竞争力. 城市规划, 2004[5]:43~50.
- 4 陈为邦. 对新时期我国城市规划若干问题的探讨. 城市规划汇刊, 2004[6], 同济大学出版社
- 5 赵珂, 赵钢. “非确定性”城市规划思想. 城市规划汇刊, 2004[2], 同济大学出版社.
- 6 朱介鸣, 赵民. 试论市场经济下城市规划的作用. 城市规划, 2004 [3]:43~47
- 7 朱介鸣. 市场经济下城市规划引导市场开发的经营. 城市规划汇刊, 2004[6], 同济大学出版社.
- 8 崔宝祥. 论城市规划的系统性本质. 城市规划汇刊, 2004 [6], 同济大学出版社.
- 9 仇保兴. 城市经营、管治和城市规划变革. 城市规划, 2004[2]:8~22.
- 10 仇保兴. 城乡统筹规划的原则方法和途径. 在城乡统筹规划高层论坛上的讲话. 2005-8-26.
- 11 汪光焘. 认真研究改进城乡规划工作. 城市规划汇刊, 2004 [11]: 14~18. 同济大学出版社.

- 12 梁鹤年. 西方规划思路对修改中国规划法的参考. 城市规划, 2004 [7]:37~42, 63.
- 13 陈锋. 转型时期的城市规划与城市规划的转型. 城市规划, 2004[8]: 9~19.
- 14 陈秉钊. 城市规划专业面临的历史使命. 城市规划汇刊, 2004[5] 25~28. 同济大学出版社.
- 15 赵民.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进一步推进我国城市规划学科的发展. 城市规划汇刊, 2004[5]: 29~30. 同济大学出版社.
- 16 黄一焜. 环保总局的声音. 经济观察报, 2005-1-24, 第 33 版.
- 17 曹传新等. 全球化时期我国城市规划思维变化解析及发展图景. 自然科学进展, 2005[9]: 1042~1047.
- 18 布赖恩·爱德华兹. 可持续性建筑. 周玉鹏等译. 北京: 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3.
- 19 Jane Jacobs, 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 金衡山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5.
- 20 Jonathan Barnett. Planning for a New Century. Island Press Washington, 2001.
- 21 Peter Hall, 城市和区域规划. 邹德慈, 金经元译.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85.5.
- 22 Peter Hall, The Centenary of Modern Planning. In: Robert Erecstone, ed. Urban Planning in a Changing World: the 20th Century Experience. E&FN Spon, 2000. 20~39.
- 23 理查德·瑞吉斯特. 生态城市——建设与自然平衡的人居环境. 王如松, 胡聘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
- 24 Saskia Sassen, Cities in the Global Economy. In: Roger Summonds, Gary Hack, eds. Global City Regions: Their Emerging Forms. Spon Press, 2000. 269~276.
- 25 Willem Salet, Adreas Faludi (eds). The Revival of Strategic Spatial Planning. Royal Netherlands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 1999.

收稿日期: 2005-11